

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建構及其基本方法

張哲俊

[提 要] 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比較文學文獻學的著作,交流關係的本質是文獻關係,研究交流關係必須建立在文獻學基礎上,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有益於正確校勘文本的訛誤,準確解釋語詞與事物。在訛誤的文本基礎上研究交流關係,必然帶來重重問題。比較文學文獻學是以閱讀書目校勘與研究交流關係的方法,既要校勘與註釋文學文本,同時也要研究交流關係,這就需要承擔古典文獻學與比較文學的雙重任務。為此就有必要引入閱讀書目,閱讀是產生交流關係的基本條件。以比較文學文獻學的方法校勘、註釋,可以發現一對一的線狀關係並不是交流關係的主要形態,網狀關係才是主要形態。

[關鍵詞] 比較文學 文獻學 校勘 註釋 方法

[中圖分類號] I0-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5)01-0005-21

一、以校註方式研究交流關係是基本方法

比較文學不是十分古老的學科,但也不是新鮮出爐的學科。比較文學不是陌生用語,文獻學也不是陌生用語,合在一起卻是完全的陌生用語與全新領域。翻看比較文學的發展歷史,就會發現這樣的一個事實:比較文學在近兩百年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亞,從來沒有自己的文獻學,但學術界沒有為此焦慮。學術界使用過一些相關用語,但未必可以稱之為比較文學文獻學。比較文學文獻學可譯為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hilology,或者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ibliography。文獻學多用 Philology,亦譯為語文學、語言學等。Bibliography 譯為書目、索引、參考書目,又譯為目錄學、文獻學、書誌學等。西方學界既用 Philology,也用 Bibliography,但尚未見到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hilology 或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ibliography 的著作或論文。日本學者將 Philology 譯為文獻學,而不是語文學,但在日本也沒有出現過比較文學文獻學的論著。

世界主要的圖書館都可在網上調查書目,以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hilology 與 reading list 調查了主要的圖書館,其中有哈佛大學圖書館、耶魯大學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康奈爾大學圖書館、牛津大學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大英圖書館、東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首爾大學圖書館等等,但沒有能夠查到比較文學文獻學的相關信息。調查的結果有兩種:

其一,比較文學論著或比較語文學(比較文獻學)著作。費爾南德·巴爾登斯珀格、沃納·P.

弗里德里希的《比較文學書目》(Fernand Baldensperger and Werner P. Friederich, *Bibliograph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1950)記述了比較文學的書目,但還不能認為是比較文學目錄學著作。塞繆爾·A. 洛溫斯塔姆的《聖經與古代東方文學的比較研究》(Samuel A. Loewensta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Biblical and Ancient Oriental Literatures*)是比較文學著作,而非比較文學文獻學。Comparative Philology 可以譯為比較語言學,也可以譯為比較語文學、比較文獻學。舍勒·德·維爾的《比較語言學大綱——歐洲語言的概要》(M. Schele De Vere, *Outline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With a Sketch of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rranged Upon Philologic Principles; And a Brief History of the Art of Writing*),大多情況下 Comparative Philology 譯為比較語言學,但也可譯為比較語文學,這是與比較文學文獻學相近的領域。《比較語文學與〈約伯記〉文本:一項方法論研究》(*Comparative Philology and the Text of Job: a Study in Methodology*),比較語文學、比較文獻學也會研究文學文本的交流關係,但不是以閱讀書目的文獻用例來校註並研究交流關係,比較文獻學、比較語文學與比較文學文獻學存在着相當大的距離,比較語文學雖然古老,但沒有生長出比較文學文獻學。20 世紀末以來不少西方學者呼籲回歸語文學,但沒有建構新方法。最近於比較文學文獻學的比較語文學,西方學界的研究歷史相當悠久,但未見引入閱讀書目校註交流關係,與比較文學文獻學存在着不小的差異。國內學界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比較文獻學的論著,但也不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成果。^①

其二,閱讀書目(reading list)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關鍵詞,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基本方法是以閱讀書目的文獻用例校註。閱讀書目也是調查有無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重要線索,但並沒有查到相關信息。一些藏書目錄的研究近於比較文學目錄學,但二者存在天壤之別,無法認為藏書目錄研究就是比較文學目錄學。《雷丁修道院圖錄·雷丁修道院 12 世紀的藏書》(*Cartulary of Reading Abbey A 12th-century Cartulary of Reading Abbey*),研究了雷丁修道院的藏書室。1792 年一個磚瓦匠在修道院的牆洞裡發現了藏書,以墨水和顏料書寫於牛皮紙,時間是約 1190~1195 年。這種研究屬於古典目錄學的研究,而非比較文學目錄學。在《中世紀修道院圖書館》(Alison Ray, *Medieval Monastic Libraries*)中,艾莉森·雷探索了中世紀圖書館的收藏以及這些圖書館是如何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發展和變化,這是比較典型的藏書書目研究。藏書書目也可視為閱讀書目,藏書書目的研究自然也就是閱讀書目的研究。但比較文學文獻學不是單純研究藏書書目或閱讀書目,而是研究閱讀書目、藏書書目與校註對象的交流關係。如果修道院的某人留下了著作,需要研究這一著作與藏書書目的語詞關係。單純研究藏書目錄,就不是比較文學文獻學。《描繪比較文學中比喻語言的起源》(Richard Trim, *Mapping the Origins of Figurative Languag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21)似乎是近於比較文學文獻學的著作,比較文學文獻學也需要研究語詞的來源。但此書還是更近於古典文獻學,古典文獻學着重研究強調典源,而非典據。東亞古籍校註的基本內容之一是註出典源文獻,尤其是日本、韓國的古籍註釋常常註出中國文獻的典源。這也是研究交流關係,但這是在古典文獻學層面上註釋,不是在比較文學文獻學層面上註釋。在典源層面上只能產生古典文獻學,在典據層面上可以產生比較文學文獻學。比較文學註釋學強調的是典據,而非典源,只有典據才是交流關係的標誌。

英語沒有比較文學文獻學之類的表述,並不表明沒有比較文學文獻學之實,但遺憾的是至今尚未發現類似內容的論著。就此問題曾求教於西方學者,西方學者以為不會存在類似論著,這種說法與調查圖書館的結果完全相合,也與 20 世紀西方語文學的發展狀況吻合^②。比較文學有近兩百年

的歷史,如果一直沒有比較文學文獻學,也是一個需要反思的問題:

其一,文獻學短於理論的難題與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實踐意義。古典文獻學的特點在於實踐,校讎學是古典文獻學的核心領域,長於實踐,短於理論,章學誠以為“心領神會,無可傳”是校讎學的基本特徵:

古者校讎書,終身守官,父子傳業,故能討論精詳,有功墳典。而其校讎之法,則心領神會,無可傳也。近代校書,不立專官,眾手為之,限以程課,畫以部次,蓋亦勢之不得已也。校書者,既非專門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則校讎之法,不可不立也。^③

古典文獻學在發展數千年之後,仍然缺少理論,只能父子傳承,心領神會,說明了這一學科的基本特徵。但章學誠以為建立校讎之法十分重要,畢竟校書不是一人之力能夠完成的事業,需要諸多學者共同努力,這就需要建立共同的方法與規則。古典文獻學理論著作和教材不少,但內容與方法大同小異,這種狀況證明章學誠所言不虛,短於理論是古典文獻學的難題,更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難題。

比較文學文獻學更難建構的原因還來自比較文學研究的自身,比較文學學者很少從事文獻學研究,也不大校註古籍文本,這是比較文學自身的問題。產生這一缺陷的原因不明,很多學者不約而同地選擇忽略文獻學,文獻學幾乎成為了遺忘的角落。即使偶爾校註別集,也是延用古典文獻學的方法,沒有以校註方式研究交流關係,也就難以產生比較文學文獻學的構想。比較文學從不缺少理論,各種理論層出不窮。比較文學的豐富理論應當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深厚基礎,但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助益:比較文學文獻學無法來自現有的比較文學概念或理論,很多理論的重點解釋已有的文學現象,但是沒有建構新的方法,沒有發現新的交流關係,理論也就難以解釋不存在的事物。比較文學文獻學只能來自文獻學的校註實踐,但前人沒有提供比較文學文獻學的校註實踐,這是近兩百年來沒有出現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主要原因。

文獻學是人文學科的共同基礎,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等等都需要建立在文獻學的基礎之上。比較文學的理論研究、平行研究與其他學科並無不同之處,也就沒有理由建立自己的文獻學。但是交流關係的研究有所不同,交流關係的本質是文獻的交流關係,理論研究或平行研究一般並不需要研究文獻的交流關係,只要保證文獻本身準確無誤,就具備了研究的文獻學基礎。研究交流關係同樣也需要文獻的準確無誤,但必須在此基礎上繼續研究文獻的交流關係。如果古典文獻學的校註方法,能夠滿足研究交流關係的需要,也就不需要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但事實是古典文獻學不能滿足研究交流關係的需要,這樣就必須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但這不是古典文獻學的問題,古典文獻學是與比較文學不同的學科,沒有必要承擔比較文學的任務。這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任務,但比較文學沒有展開這樣的研究。目前為止文獻學的各種理論著作不少,六朝文學文獻學、古典戲曲文獻學之類的著作,基本沒有建構新方法,主要記述了特定時期或文體的重要書目。此類文獻學不具有方法論意義,也不存在建構的問題。如果在這種意義上討論比較文學文獻學,那麼比較文學文獻學早已存在了。

其二,前概念、前理論的原始實踐與原始經驗,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必要條件。原始實踐與原始不只是初始實踐與經驗,還應當是產生概念、理論之前的研究,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迫切需要的不是概念與理論,而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構想。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基本構想是以閱讀書目校註與研究交流關係,這一構想必須付諸校註實踐,也就可以產生原始實踐與原始經驗,也就有了產生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可能性。校註的個案實踐與比較文學文獻學密不可分,彼此不斷地循

環推進與深入,既需要不斷調整校註個案,也需要不斷調整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內容,這樣最終才能清晰明確,從而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如果只有校註實踐,沒有撰述比較文學文獻學,很多思考難以深入,最終也難以形成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基本概念與表述。這樣的研究工作量龐大,又有極高的冒險性,文獻學本來就短於理論,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更易失敗,失敗就意味着付出的巨大努力化為烏有。當然人文學科的研究即使失敗了,也不至於沒有論文、著作。不過成功與否還是存在客觀依據:新的方法有了新的發現,呈現出以往未曾看到的交流現象,因此更加接近交流關係的事實,推進比較文學交流關係的研究,也就基本完成了任務。新的發現與新的方法聯繫在一起,不是能以已有的方法替代的,如果以已有的方法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那麼即使宣稱建構了比較文學文獻學,也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迄今為止尚未發現以閱讀書目校註與研究交流關係的個案實踐,也未見比較文學提供原始實踐的數據,也就不會提出原始問題:如何調查閱讀書目,如何在校註中使用閱讀書目?如何驗證閱讀書目的有效性?原則上使用閱讀書目校註的方法是否存在可能性?校註與閱讀書目、文學交流的關係如何?是以閱讀書目為先,還是以相似性為先,二者存在怎樣的關係?文學層面的交流關係(影響關係)是否只有一對一的線性關係?是否還存在其他不同的交流關係?如果存在多種交流關係,那麼哪一種交流關係是主流關係?這些都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需要解決的原始問題。如果先行研究能夠提供數據,即使是不完整的數據,也可以使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變得相對容易。然而事實是只能從積累原始實踐與原始經驗開始,這是原始創新的前提,也是推進的原始動力。然而原始問題在學術研究的現狀中未必是好的課題,以往的研究經驗、知識往往是判斷最新話題、內容以及價值的依據。一旦以往的經驗、知識失去作用,就難以產生期待或預判,自然不會產生興趣。學術研究如同市場,存在熱度的問題,原始問題如同沒有品牌的產品,全無市場。聞風而動,追隨主流,就不會遭遇原始問題帶來的困境,這也是比較文學文獻學難產的原因之一。

其三,西方學者對影響關係、事實研究的否定,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阻礙。迄今未見比較文學文獻學,與國際學界對影響關係實證研究的批判不無關係。克羅齊、韋勒克等人對影響研究的批判早已成為學界的主流看法,國際學術生態不宜於比較文學文獻學,也就難以產生比較文學文獻學。克羅齊、韋勒克等人的看法引起了中國學界的共鳴,深深影響了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韋勒克等人描述了交流關係研究的問題,但只注意到文學性、美學分析的重要性,極力割裂基礎研究與文學性研究的關係,以為基礎研究完全無用,沒有價值。克羅齊以為影響研究不過是雜亂無章的資料庫供應商:“我們希望,這份新創刊的美國學刊將不會使自己侷限於搜集那些無關的、雜亂無章的資料方面,從而成為歐洲龐大資料庫的供應商,而是有助於達到對人類文學史各個部分進行歷史——美學的綜合。”^④如果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任務是調查文獻關係,最終提供的是交流關係的文獻總匯,正是克羅齊所說的資料庫。文獻調查離不開調查包含交流關係的語詞、事物,結果看起來雜亂無章,雞零狗碎。而文學作品是一個完整有機的文學作品,被割裂成了一堆沒有關聯的因素,不符合文學作品的存在形態。韋勒克以為文學的交流關係是貿易關係,影響關係的研究者只注意研究外部關係,外部關係之間缺乏聯繫。文學作品是有機的統一體,作品之間不存在因果關係:“文學研究中的‘原因論’是完全不符合批判原則的;雖然人們可以收集到文學中的平行現象和類似現象,但沒有人能夠證實一部藝術作品是由另一部藝術作品‘引起’的。”^⑤“藝術作品不只是淵源和影響的總和,它是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從別處衍生出來的原材料不再是毫無生氣的東西,而是與新的結構融為一體了。”^⑥韋勒克將文學作品視為統一的有機體,特定作品與另一作品之

間不存在因果關係,這是在強調文學性的研究,把握文學的思想、情感、風格、藝術等等,以為美學分析才是文學研究的正道。

克羅齊、韋勒克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實際上並不正確。交流事實與文學性不是對立的二元關係,完全可以因果關係。如果沒有交流關係,就不會產生很多詩歌。文學研究也是因果關係的研究,交流事實是基礎研究,可以為文學研究提供必要的信息。如果沒有基礎研究,經常無法讀懂,甚至無法展開文學性研究,文學性研究的前提是必須確定與了解詩歌文本的必要信息。瑞溪周鳳《栗里 寬正癸未歲,予寓西山弊廬,就栗下構一間屋,戲號栗亭,末詩及之》:“收得淵明故里秋,素封差樂勝王侯。鳳凰村裡栗亭小,我亦同風貉一丘。”^⑦這首詩歌是由兩個層面構成的:基礎層面主要是語詞、事物的基本意義與具體所指,這是在研究文學性之前需要展開的研究。交流關係屬於基礎層面,交流關係本身並不就是語詞、事物的基本意義與具體所指,但交流關係可以提供基本意義與具體所指的事實依據,因而交流關係只能歸入於基礎研究層面。詩題的“栗里”是地名,五山文學中至少有三處,那麼“栗里”究竟是指哪裡,含有怎樣的意義?這是進行文學性研究之前需要解決的問題。確定詩題的“栗里”是指哪一處,直接關係到此詞的基本意義:一是陶淵明的故里栗里,中國江西廬山溫泉北面一里許。中日文學的用例相當常見,橫川景三《寶洲住播法雲諸山》:“淵明採黃花於栗里,晚節所存。”^⑧蘇軾《和陶九日閒居》:“龍山憶孟子,栗里懷淵明。”^⑨二是日本播磨國的栗里。天隱龍澤《栗里偶作》:“五年一到栗村寺,半嶺斜陽依舊明。……更喜同袍桃隱叟,旬餘留我話平生。”^⑩玉村竹二註為“播磨栗棲村”,因有栗字,故取唐風地名為栗里。栗棲在播磨,播磨又稱播州,是日本古代令制國之一,屬山陽道,大約相當於今兵庫縣南部。三是日本近江的栗里,蘭坡景菫《竺叟源公禪定門三十三回忌香語》:“娑婆世界南瞻部州大日本國近江州栗里居住藤原守廣等。”^⑪日本的近江屬東山道,俗稱江州,大體相當於今滋賀縣,其境內有日本第一大湖琵琶湖,古稱淡海。

瑞溪詩歌寫的是他在京都西山鳳凰村的居所,不可能是指播磨與近江的栗里,只能是指陶淵明的故里。瑞溪周鳳因西山居所有一栗樹,就想起了陶淵明的栗里,就取名為栗亭,以栗亭喻陶淵明的栗里,以為日本京都的西山就存在陶淵明的故里。陶淵明、栗里是交流關係的因素,沒有這一交流關係,就不會產生瑞溪周鳳的《栗里》詩,陶淵明與《栗里》詩歌的關係就是因果關係。研究《栗里》詩需要從交流的因果關係角度來研究,只要確定了栗亭與陶淵明栗里的關係,才能明白此詩的基本意義。瑞溪周鳳將自己的居所名為栗亭,是為了與陶淵明的栗里建立喻指關係,表明自己是陶淵明的同類。栗亭沒有官爵俸祿,但更為快樂,這是能夠確定的基本意義。交流關係是《栗里》詩歌文本內容的一部分,是文學性因素,並不外在於文學性或有機統一體之外。陶淵明與栗里是《栗里》詩歌的內在因素,但也是瑞溪周鳳的生活世界,瑞溪周鳳借助文學交流營造了自己的生活世界:日本京都鳳凰村的栗樹,是瑞溪周鳳生活世界的一部分,陶淵明和栗里也是瑞溪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兩個部分合而為一是生活世界的完整景象。這種現象在日本普遍存在,播磨與近江的栗里採用了同樣的方法,使文學交流成為生活世界。磨播的栗里本來名為栗棲,但因陶淵明,五山詩人改稱栗里。文學交流、生活世界、詩歌文本交織在一起,這是確定語詞、事物意義的根本基礎,交流關係、生活世界與解讀、研究詩歌文本的意義聯繫在一起。

韋勒克批判博學的比較文學研究者,但詩歌文本包含各種信息與知識,如果比較文學學者能夠成為博學者或資料庫,借助各種信息與知識,提供所有的交流信息,是最為理想的狀態,將大大推進比較文學的發展。只是這並不容易,恐怕也不存在這樣的學者。瑞溪周鳳的《栗里》並非只有一條

文學的交流關係,素封也是來自中國的一個典故,同樣也需要了解此詞的基本意義以及背後的歷史因素。素封的中日文學用例常見,邵庵全雍《扇面山水》二:“喬木村荒三四屋,素封有此好湖山。”^⑩《史記·貨殖列傳》:“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張守節正義:“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⑪素封與陶淵明、栗里沒有直接的關係,可以認為是東塗西抹,披百家衣。但不同的交流因素重新組合,可以表現完整的意思,構成了有機的統一體。交流關係在基礎層面彼此沒有關係,支離破碎,但進入到文學性層面不再是雞零狗碎,彼引關聯,共同表現同一意義。在瑞溪周鳳的詩歌中,素封是指瑞溪退居的生存狀態,此時瑞溪 73 歲,沒有擔任僧祿等五山官寺的高層僧職,但更為快樂。栗里與素封是兩個沒有關係的詞匯,因而是雞零狗碎。但是沒有逐一研究雞零狗碎,那麼文學性的整體研究必然喪失客觀依據,陷入更多的主觀分析。基礎研究不做美學分析與價值判斷,但美學分析、價值判斷必須建立在雞零狗碎的基礎上。韋勒克等人所說的雞零狗碎,將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主要任務。

韋勒克認為比較文學的危機在於“外部事實主義”,死死抱住事實的聯繫,但真正帶來比較文學危機的是克羅齊、韋勒克等人,將交流關係的事實與文學性割裂為二元對立關係,才是比較文學的真正危機。韋勒克等人否定文獻調查,擯棄交流關係的研究,給比較文學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不少學者轉向了其他研究,甚至也跟隨批判文學研究的事實主義。這摧殘了文學性研究,也重擊了交流關係的實證研究。不少學者宣稱人文學科的實證研究是偽科學,並不能像科學研究那樣可以重複或複製。然而交流關係的實證研究可以重複或複製,以閱讀書目校註,就需要調查閱讀書目用例的分布,閱讀書目中究竟存在一條用例還是幾條用例,不管何人來調查,都會重複同一數據。人文學科的研究不可重複是在一定範圍內,不可無限放大。比較文學的危機是以文學性研究替代交流關係的實證研究,沒有更多關注事實關係,使比較文學缺少根基,主觀分析滿天飛舞,各種訛誤隨處可見,因此受到批評,危機四伏,甚至有的學者批評比較文學是不大可靠的學科。

比較文學文獻學是研究文學文本及其交流關係的文獻學方法,與古典文獻學存在密切關係。但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領域不如古典文獻學那樣廣闊,古典文獻學主要有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偽學、書籍史以及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出土文獻研究等等。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主要領域是目錄學、校勘學、註釋學,兼及文字學、歷史學等其他領域。比較文學文獻學包含了如下的內容:

其一,研究對象是交流關係。交流關係指文學文本的交流關係與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文學的交流關係是指文學層面的交流關係,文學文本包括了純文學文本,也包括了非純文學的文本,更準確地說是文本的交流關係,這沒有超出現在流行的大文學的概念。在文學層面研究交流關係,就是要確定交流對象,交流對象是由閱讀書目的書目、篇目和語詞用例構成的,即典據和典據範圍,研究交流關係就是不斷地確定交流對象的過程。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是指不同國家生活世界之間的交流關係,生活世界是指詩人生存的物質世界與人或事物,不同國家的物質與人或事物也存在交流關係,這種交流關係也會在文學文本留下印跡,通過文學文本的印跡能夠還原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文學層面的交流關係與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存在分合關係,但比較文學文獻學主要是研究文學層面的交流關係。

其二,校勘是研究交流關係的必要方式。校勘是整理古籍的方式,也是研究交流關係的方式,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核心部分之一,這是由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基本性質與任務決定的。文學文本是由語詞組合而成的語言系統,語詞不一定是正確的,訛脫衍倒並不鮮見。校勘學是古典文獻學

的核心部分,基本任務是校正文本中的訛脫衍倒,還原正確的文本,為閱讀與研究建立正確的文本基礎。比較文學校勘學有雙重任務,需要還原正確文本與還原交流關係。兩個任務不同,但密切相關:文學文本的訛脫衍倒,一方面破壞了正確文本,另一方也可能破壞交流關係。修正文本的訛脫衍倒,可以還原正確文本,同時也可以還原正確的交流關係。校勘有助於還原交流關係,還原交流關係也可以提供校勘依據。一字一詞的訛誤不一定引起意義的重要變化,不一定影響研究文本。但完全可能引起交流關係的變化,有時交流關係就存在於一字一詞的微妙差異。尤其出現複數的相似用例時,更需要細查一字一詞的差異。不同字詞透露的是不同的交流信息,信息就在細節,忽略一字一詞的訛誤,就可能帶來錯誤的認識。

校勘需要在兩個層面進行:一是單純語詞層面的校勘,主要依賴於版本和小學、語境。版本不同,所用字詞就可能不同,根據不同版本校正訛誤是校勘的基本方式。古代文獻經常轉錄同一段記載,不同書目的記載也是校勘的重要依據。二是生活世界事實層面的校勘。語詞是記錄生活世界的語言符號,有時在語言文字層面上沒有錯誤,並不等於沒有錯誤,如與生活世界的事實不合,就有理由懷疑存在訛誤,這就需要根據生活世界的事實校勘。按照校勘慣例一般認為最早的版本最為可靠,但最早的版本也有訛誤,根據生活世界的事實校勘是必要的,可以名為事實校勘。事實校勘對比較文學文獻學同樣有着重要意義,生活世界的事物可以通過跨國交流形成,這就還需要研究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這也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任務。

其三,註釋是研究交流關係的基本方式。比較文學文獻學的註釋也有雙重任務,既要完成古典文獻學的註釋任務,也要完成研究交流關係的任務。交流關係存在於訛誤語詞,但主要還是存在於沒有訛誤的語詞,因而註釋必然是研究交流關係的基本方式,大部分交流關係的還原只能依賴於註釋。註釋學在古典文獻學中可有可無,但在比較文學文獻學中佔據重要地位,否則無法完成研究交流關係的任務。古典文獻學與比較文學文獻學的註釋任務不同,也就會存在明顯的差異:

首先,古典文獻學的註釋主要是解釋語詞的基本意義,也用於記述語詞、典故的來源等等。由於年代久遠,很多語詞意義難解,造成閱讀障礙,解釋語詞、典故的意義與來源,就成了古典文獻學註釋的主要任務。古典文獻學指稱文獻關係的用語比較豐富,典故、用事、用典、典據、典源等等都是指稱文獻關係的用語,大部分情況下這些用語都是指典源。這些用語的差異甚微,一般不加區別。比較文學文獻學擇用典源與典據的用語,分別指稱最初文獻與直接依據的文獻,典據與典源範圍其實就是交流對象。研究典源主要是古典文獻學註釋的任務,研究典據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任務,這是兩種不同的文獻關係。

其次,古典文獻學與比較文學文獻學使用的文獻範圍不同,前者主要使用本國文獻,後者使用他國文獻與本國文獻。密集使用他國文獻,才有機會發現比較文學的交流關係,這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必然選擇。但他國文獻並不能完全滿足研究交流關係的需要,還需要使用本國文獻,本國文獻能夠呈現交流關係的接受狀況,尤其是交遊圈別集的本國文獻,更明顯地顯示了交遊圈的交流功能,也顯示了交遊圈在交流關係的重要功能。

再次,註釋改造為研究交流關係的方式,需要引入古典文獻學沒有的因素。這些因素主要有閱讀書目、潛在書目、替代書目、生活世界、校註的論文化等,都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閱讀書目、潛在書目、替代書目都是交流關係的基本因素。這裡所說的替代書目是傳入書目,可以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也可以用於校勘、註釋。生活世界擴大了調查交流關係的範圍,校註的論文化是解決交流關係難題的特殊方法。

以校註作為研究交流關係的方式是重要的變革,在此之前國內外學術界,基本是以論文、專著來研究交流關係。學術界從來沒有懷疑過論著方式存在什麼問題,未加思索就接受,甚至作為了一生研究的方式。這是因為自從近代建立西方學術模式以來,論著屬於學術研究的模式,校註屬於古籍整理的模式,二者各行其道,彼此分離。研究交流關係屬於學術研究,不屬於古籍整理,自然應當使用論著方式,而不是使用校註方式。這是學術研究與古籍整理分離的學術體制帶來的結果,但是將學術研究與古籍整理結合起來,必然有助於推進學術研究。這不是以校註取代論著,而是在論著之外新增一種研究交流關係的方式,校註可以提供論著不能提供的學術價值:

其一,校註可以排查所有交流關係,從而觸摸與發現不同類型的交流關係。以往研究交流關係都是採用論著方式,論著方式的特徵是選點研究,可以集中深入地研究別集交流關係的特定問題。這是選點研究的明顯優勢,但同時也是天生缺陷。太多的交流關係無法進入研究視野,有的交流關係十分簡單,不需要太多字數,難以成為論著的研究對象。這樣就會喪失觸摸形形色色交流關係的機會,只有比較全面地觸摸交流關係,才有機會接近交流關係的不同形態。研究交流關係需要選點研究,也需要排查研究。校註是能夠排查所有交流關係的唯一方式^⑩,理論上可以校註別集的每一字詞,也就可以排查每一字詞的交流關係,必然遭遇各種複雜狀況,這是論著的選點研究永遠無法提供的學術價值。

其二,全面排查的總體數據是整體研究交流關係的基礎。全面排查別集所有交流關係的目的之一,是調查交流關係的總體數據,也可以調查不同形態交流關係的總體數據,這是總體研究交流關係的基礎。調查與記錄交流關係總體數據的方式是目錄與索引,目錄與索引也可以是總體研究的方式。以往研究交流關係的總體狀況,主要是依據總體印象,也就難免出現更多的失誤與偏差,但以總體數據研究可以更為客觀準確。文學交流關係的本質是文獻關係,思想、形象、情感、形式、技巧等等文學性因素也可以產生交流關係,但會超出文獻關係的範圍。不過文學性因素的交流關係多會體現語詞層面,交流關係的總體數據仍然能夠一定程度上體現文學性因素的交流關係。比較文學文獻學的研究重點是交流關係,交流關係是歷史事實,數據化可以直接顯示交流事實的基本狀態,具有難以替代的意義。

二、閱讀書目的引入與交流關係認知的修正

以校註研究交流關係的最大價值,是能夠整合比較文學與古典文獻學,但這只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初始動作,還不能滿足研究交流關係的需求,因而必須引入閱讀書目、潛在書目(交遊圈別集)與替代書目等等新因素,原則上以閱讀書目校註與研究交流關係,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雙重任務與基本方法。閱讀書目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關鍵因素,也是與古典文獻學的分水嶺。比較文學文獻學使用閱讀書目的用例校註是非常重要的變革:首先,可以解決古典文獻學選擇用例的難題與確立選擇文獻用例的基準。古典文獻學沒有校註使用文獻用例的規定,這給校註帶來了便利,但也帶來了難題。當出現複數的文獻用例時常常難以選擇,即使擇用了其中的用例,也沒有合理的依據。以閱讀書目校註就是規定了擇用文獻用例的基準,閱讀書目有一個用例,就使用一個用例校註;閱讀書目有複數用例,就使用複數用例。閱讀書目沒有用例,就擇用早於校註文本的文獻用例。其次,以閱讀書目的用例取代一般書目的用例,不會改變校註的基本性質。一般書目的文獻用例可以提供校註需要的信息,閱讀書目的用例也可以提供校註需要的信息,閱讀書目的用例必然能夠提供更為準確的信息,從而可以提高校註的準確性。再次,閱讀書目包含了豐富的交流信息,

通過閱讀書目的用例可以探索交流關係,最終確定交流關係,並記錄於校註。因而閱讀書目的用例既可完成古典文獻學的校註任務,也可完成研究交流關係的任務,閱讀書目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關鍵因素。

目錄學是古典文獻學的核心領域,比較文學文獻學需要建立以閱讀書目為基礎的目錄學,這是與古典目錄學完全不同的目錄學,必然出現一些新的問題。

第一,閱讀書目、替代書目以及潛在書目的構成與調查。

閱讀是交流的基本方式,沒有閱讀,就沒有文學,也沒有文學的交流關係。閱讀是微妙的心理過程,無法作為研究依據,但閱讀書目可以作為研究依據。閱讀書目是指特定詩人的閱讀書目,校註可以選擇詩人的別集,也可以選擇總集或選集,但最好是選擇詩人的別集,總集或選集涉及很多詩人,不易調查閱讀書目。以閱讀書目校註的前提,是必須存在閱讀書目的相關文獻,日記、隨筆、詩文、札記、註書等等,經常提及書名、篇名與人名,這都是閱讀書目或相關線索。詩人的藏書目錄也是一種閱讀書目,學界時而發表詩人作家的藏書目錄,這是最容易獲得的閱讀書目。古代亦有藏書目錄,主要是佛寺或修道院的藏書目錄,相關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多是單純研究藏書目錄,沒有作為閱讀書目用於研究,沒有研究藏書目錄與詩人別集的交流關係。

以閱讀書目校註應當包括潛在閱讀書目,即潛在書目,是交遊圈詩人的別集。以閱讀書目校註並非只用他國書目,也需要使用本國書目,這樣可以發現潛在書目。潛在書目也是交流關係的書目,很多交流關係是通過交遊圈及其潛在書目來實現的。交遊圈對詩人的一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學界一直關注詩人與交遊圈詩人的活動,這是詩人生平、思想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潛在書目的意義不只是在於生平,更重要的是特定詩人別集與交遊圈詩人別集的關係。交遊圈別集未必能夠進入閱讀書目,詩人往往忽略或漏記交遊圈別集,但並不表明交遊圈別集並不重要,也不表明沒有閱讀過交遊圈別集或詩歌。如果調查語詞的分布狀況,就會發現相當一部分語詞全部或絕大部分出現於交遊圈詩人別集,這種特徵還體現在共同的話題、典故、事物、人物等等,表明特定詩人別集與交遊圈詩人別集存在交流關係。交遊圈別集即使沒有出現在閱讀書目的清單,也具有與閱讀書目類似的功能與意義。以潛在書目校註的方法主要有兩個部分:一是需要調查交遊圈詩人名單;二是不能只以交遊圈別集來校註,要使用更多的同代別集來校註,這樣才能發現交遊圈別集的功能與意義。交遊圈別集是否能夠成為潛在書目,也需要驗證有效性,當語詞用例全部或集中出現在交遊圈別集,就證明存在有效的潛在書目。

以閱讀書目校註的範圍是有限的,但這不等於比較文學文獻學的終結。如果沒有閱讀書目的相關文獻,沒有閱讀書目,那麼可以用替代書目校註,替代書目是傳入書目。替代書目的價值不如閱讀書目,但也包含交流信息與線索,這是能用替代書目校註的原因。替代書目與閱讀書目存在密切的關係:閱讀書目必然是傳入書目,沒有傳入,就不可能成為閱讀書目。確定為閱讀書目,就不需要確定閱讀書目傳入的時間,閱讀書目一定在詩人之前或同時已經傳入。傳入書目未必是閱讀書目,需要在校勘、註釋的過程中了解是否成為了閱讀書目。如果在替代書目中發現了閱讀印跡,出現了可以確定為典據的語詞或事物,那麼替代書目也可以變成閱讀書目,自然也有理由確定交流關係。

系統調查替代書目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艱鉅任務,替代書目最好以斷代為單位,或者以特定詩人亡卒之前為止。沒有傳入時間的傳入書目,難以作為替代書目,因為只有不遲晚於詩人的傳入書目,才可以作為替代書目。調查傳入書目及其時間並不容易,不可能一朝一夕之間完成,需要很多

學者共同付出努力,需要持續不斷地研究,理想狀態是查出所有傳入書目的傳入時間。日本古代文人早已注意到調查傳入書目的重要性,《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是日本最早的傳入書目著作,成書於日本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記錄了平安前期為止傳入的漢籍總目。《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基本就是斷代替代書目,可以用於平安前期之前日本作品的校註,例如《懷風藻》。特定詩人的替代書目是斷代替代書目基礎上的延伸,但也可以補充斷代替代書目。《日本國在書目錄》沒有著錄杜甫別集,日本平安初中期有無杜甫別集傳入日本,就是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這是研究奈良文學、平安初中期文學與杜甫詩歌關係的決定性因素。如果杜甫別集未曾傳入,那麼這一時期杜甫別集的交流關係研究是偽問題,不需要研究。如果杜甫別集已經傳入,那麼杜甫別集的交流關係研究,是需要研究的真正問題。調查他國書目的傳入時間,是一切研究交流關係的需要,也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需要,由此可以明白替代書目的重要性不亞於閱讀書目,系統調查傳入書目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重要一環。近年來不少中國學者調查了藏於日本、韓國以及越南等國的中國書目,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但這些書目不等於替代書目,必須在這些書目的基礎上研究書目傳入的時間,才有可能成為替代書目。

第二,校註是驗證所有閱讀書目有效性的唯一途徑。

閱讀書目只是存在交流關係的可能性範圍,因而還存在如何驗證有效性的問題。這個問題早已存在,學術雜誌時而發表詩人的藏書目錄,幾乎所有學者都知道藏書目錄的重要價值,但茫然無措,無從下手,不知道如何使用全部藏書目錄,更不知道怎樣研究藏書目錄與詩人別集的關係,這是因為研究者沒有找到使用與驗證全部藏書目錄的途徑或方法。以往所有的學術研究幾乎都是選擇論著方式,但論著方式無法使用與驗證全部閱讀書目的有效性。論著的選擇性研究與驗證全部閱讀書目的不可選擇性,存在着無法彌合的天然距離。這不是學者能夠解決的問題,也是學者無計可施的原因。但閱讀書目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關鍵因素,因而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否則無法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研究者需要了解詩人究竟讀過哪些書目,沒有閱讀哪些書目;哪些書目在詩人別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跡,哪些書目只是留下了淺淡的印跡,或者完全沒有留下印跡。最常見的研究方式是研究者挑選閱讀書目的一、兩本或幾本書目,研究與詩人別集的關係。這就無異於放棄研究絕大部分的閱讀書目,這樣差不多就清零了閱讀書目的價值,因此必須放棄論著的學術方式,選擇能夠排查所有閱讀書目有效性的方法,否則無法解決困擾學界很久的這一問題。

校註與論著完全不同,是唯一能夠驗證全部閱讀書目有效性的方式,因而也是使用與驗證全部閱讀書目有效性的唯一用武之地:

其一,校註的排查方式與驗證全部閱讀書目的可能性。驗證全部閱讀書目的有效性,需要使用排查方法。排查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排查詩人別集的每一語詞;二是排查全部閱讀書目。能夠提供兩種排查的方式只有校註,校註是驗證與使用全部閱讀書目的唯一用武之地。校註可以提供兩種自由,可以自由地校註所有存在交流關係的語詞,也可以自由地在所有閱讀書目範圍內尋找用例。這是論著無法提供的自由,論著總是限定在特定問題,無法自由擴展到所有語詞與交流關係。叢考、札記沒有限定問題,但只是散點研究,而不是排查,不能自由地觸及所有語詞與交流關係。只有校註能夠排查所有閱讀書目,才能了解哪些是有效閱讀書目。確定了有效閱讀書目,也就等於確定了交流關係。以閱讀書目校註詩人別集,就需要在全部閱讀書目的範圍內尋找用例。其中有一部分閱讀書目能夠提供用例,有一部分不能提供用例。能夠提供用例的閱讀書目就用於校註,無法提供用例的閱讀書目,就無法用於校註。不管校註有無使用閱讀書目的用例,只要在全部分閱讀書目

的範圍內調查了用例,就是已經使用了所有的閱讀書目,也就等於驗證了所有閱讀書目的有效性。閱讀書目存在兩種:一是無效閱讀書目,不能提供語詞用例與相關事物的信息,也就不可能存在交流關係,因而只能是無效閱讀書目。二是有效閱讀書目,此類閱讀書目能夠提供校註需要的語詞用例以及事物信息,在此基礎上可以研究確定交流關係。然而閱讀書目能夠提供用例,並不等於有效閱讀書目。閱讀書目能夠提供複數的用例時存在兩種狀況:一是提供用例的複數閱讀書目都是有效閱讀書目;二是提供用例的複數閱讀書目中,只有一本有效閱讀書目,其他閱讀書目皆為無效閱讀書目。這是因為可以確定只有一本閱讀書目產生過交流關係,其他閱讀書目沒有產生交流關係。在數字人文的時代排查交流關係是可能的,但工作量龐大,難免疏漏。

其二,以閱讀書目校註就是驗證全部閱讀書目的有效性,這是同一研究動作的兩個方面。驗證全部閱讀書目的有效性與以閱讀書目校註,不是研究的兩個動作,而是同步關係,不是在校註之前設置專門的驗證環節,在——確認閱讀書目有效性之後用於校註。以閱讀書目校註的過程,就是驗證閱讀書目有效性的過程。閱讀書目建立在書目層面,不能建立在語詞、事物的層面,但是閱讀書目的有效性不是建立在書目層面,而是建立在語詞、事物的層面。這是因為沒有任何一本閱讀書目能夠提供所有語詞、事物的用例,只能提供部分語詞、事物的用例,或者不能提供語詞、事物的用例。這意味着沒有永遠有效的閱讀書目,閱讀書目的有效性因語詞、事物的用例而變,有效性總是限定在語詞、事物用例的層面。然而校註與驗證有效性能夠合而為一,校註對象是語詞或事物,原則上使用閱讀書目的用例,那麼校註使用語詞、事物用例的同時,必然也會調查語詞、事物的用例來自哪些閱讀書目,也就可以驗證閱讀書目的有效性。以閱讀書目校註的過程,必然也是驗證閱讀書目有效性的過程,因而校註與驗證是同步關係。校註依然是校註,沒有改變校註的性質,但增加了驗證閱讀書目有效性的功能,這樣校註、驗證閱讀書目有效性、研究交流關係合為一體,校註成為了多功能的綜合研究方式。

第三,線性關係的地位與網狀關係的發現。

比較文學文獻學具有一定的使用價值,但更重要的是交流關係的認知價值。比較文學經過近兩百年的發展,已經積累了無數交流關係的研究個案,但仍然沒有全面認識交流關係的基本形態。以閱讀書目校註可以發現交流關係存在三種基本關係:一是與法國學派不同的新線性關係,二是新發現的網狀關係,三是常見關係。常見關係是基於常見語詞、事物的交流關係,常見語詞在詩文中數量最多,應當是最重要的研究部分。但實際上未必如此,常見關係是開放的交流關係,沒有交流對象,也沒有交流對象的範圍。常見語詞可以出現於任何書目,閱讀書目與非閱讀書目沒有界線,有效閱讀書目與無效閱讀書目也沒有不同。校註常見語詞的交流關係,語詞的常見程度足以摧毀閱讀書目的價值,必須放棄以閱讀書目校註的原則。理論上別集文本的每一語詞都可以校註,但常見語詞沒有閱讀障礙,也沒有可以描述的交流關係,就不必出註。春、雨、冬、雲等等語詞,既沒有必要解釋語詞意義,也沒有可以研究的交流關係,也就不需要出註研究。但還有一類基於常見知識、信息的語詞,是需要出註研究的,例如試筆、騎驢等等。試筆不如五言、七言等文學常識那樣常見,但具有同樣的常見形態。中日特定試筆詩的文本之間,沒有交流對象或交流對象的範圍,也就沒有典據關係或典據範圍。試筆的概念成為常識,基於這一常識產生了常見關係。此類常見關係可以出註,但需要採用總體研究的方法,不能執着於特定詩歌文本之間的交流關係。常見關係基於常見語詞,但常見基準可以變化:一、古今均為常見語詞;二、古代是常見語詞,但現今不是常見語詞;三、古代不是常見語詞,但現在是常見語詞。第一種完全不需要校註,第二種、第三種可以出註。

舊線性關係是法國學派描述的影響關係。法國學派將交流關係描述為二元模式^⑮，兩點一線的線性關係也就成了文學關係的標誌性特徵。線性關係是學術界了解的唯一一種文學關係，也就必然成為了研究交流關係的唯一模式。以閱讀書目校註交流關係的結果，證明線性關係是存在的：閱讀書目只能提供一個典據用例，也就只能形成兩點一線的典據關係，即閱讀書目與詩人別集的二元關係，這是新的線性關係，是交流關係，而不是源流關係。學界對線性關係的批判並不少見，其實問題不在於線性關係，而是將線性關係當成了全部的交流關係。除了線性關係之外，本來還存在其他的交流關係，但把不同形態的交流關係全部描述為線性關係，這樣必然與交流關係的事實不合，就會出現各種困難與問題：或以網狀關係質疑線性關係，或將網狀關係裁剪成線性關係，抑或將常見關係當成線性關係。其結果難免質疑與否定交流關係，但實際上質疑或否定的是線性關係。交流關係的事實狀態遠比線性關係複雜，只有更加接近交流關係的事實狀態，很多問題才會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研究者也會知道研究的推進方向與交流關係的類型定位。

引入閱讀書目研究，可以發現網狀關係，這是不同於線性關係的交流關係。線性關係是兩點一線，網狀關係是多點多線，多個交流關係傳送了同一信息，同一信息是以網狀關係的方式傳遞與接受。新線性關係只有一本閱讀書目與一個用例，只有一個交流對象，只能形成典據關係。網狀關係的多點多線是存在複數的交流對象，存在複數的閱讀書目用例或一本閱讀書目的複數用例，這樣會形成多點多線的網狀關係，網狀關係存在用例範圍，即典據範圍。典據範圍的每一閱讀書目和用例都可以是信息來源，這不是說同一信息必然來自每一閱讀書目，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即同一信息可以來自典據範圍的部分閱讀書目。線性關係清晰明確，網狀關係模糊不清，多點多線是產生模糊感的主要原因。網狀關係的每一閱讀書目用例都是疑似典據，疑似典據也是產生模糊狀態的原因。典據範圍的每一閱讀書目用例都是可能性，不像線性關係那樣確定。但網狀關係不是沒有確定性，確定的是典據範圍的邊界，典據範圍的邊界是可描述的，不像常見關係那樣無法描述。校註典據範圍就是描述網狀關係的範圍，記述網狀關係中的閱讀書目及其用例。網狀關係是由兩個部分構成的，除了閱讀書目的網狀關係範圍之外，還有潛在書目的網狀關係範圍。語詞的全部或絕大部分用例出現於交遊圈別集，就可以形成本國文獻的典據範圍。閱讀書目與潛在書目的典據範圍可以合而為一，但不會改變多點多線的形態。兩種典據範圍的本質是獨立的，閱讀書目出現典據範圍，並不意味着潛在書目也會出現典據範圍。

最後還要指出新線性關係不是唯一的交流關係，甚至不是主流的交流關係，這就顛覆了交流關係的一般認知。實際上新線性關係較少，僅為網狀關係的三分之一，但仍然應當視為一種交流關係。線性關係是鎖定的交流關係，鮮明易見。在發現網狀關係、常見關係之後，線性關係不失其價值，甚至可以根據線性關係補遺閱讀書目，這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一部分。研究交流關係應當全面了解交流關係的基本形態，這樣才能正確把握交流關係的推進方向。

三、校註的一般方法與交流關係、第三關係

古典文獻學的校註主要是在文獻層面進行的，版本是校勘的主要依據，不同版本可以提供無法預料的語詞信息，沒有不同版本，難以看出訛誤在何處，非實質性訛誤更是如此。有的學者以為沒有不同版本，就沒有什麼可以校勘的。版本校勘是最可靠的基本方法，但也存在難題：其一，各種版本互異，各有合理性，僅據版本難以校勘。這就需要在版本之外應當尋找其他的校勘依據，否則無法解決校勘的問題。如何突破版本校勘的難題，學術界的通行方法是以最早的版本為據校勘。最

早的版本最為可靠,但這只是正確的機率,最早版本也有訛誤,不能保證每一語詞都是正確的。因而必須找到版本之外的校勘依據,否則無法解決校勘的難題。其二,版本校勘的另一難題是只有一種版本,沒有其他版本,也就沒有辦法比較不同版本的異文,也就難以校勘。但是學術研究的決定性因素不一定是有無多種版本,只有孤本,也需要展開學術研究。孤本的訛脫衍倒不會因為放棄校勘,就會自動消失。如何校勘孤本的訛脫衍倒,並在還原的正確文本基礎上展開研究,是無法迴避的問題。其三,小學、語境也是校勘的重要依據,沒有多種版本的情況下,也可以根據小學、語境校勘。然而小學、語境也存在難以校勘的問題,尤其是非實質訛誤不一定造成閱讀障礙,仍然可以字順意暢,能夠了解文本記述的內容,但未必沒有訛脫衍倒。訛脫衍倒的狀況相當繁雜,沒有一種校勘方法能夠解決所有的訛脫衍倒,盡可能豐富校勘的方法是文獻學的重要任務。

校勘方法與文學的交流關係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原因之一,校勘訛誤,修正文本,是正確研究交流關係的基礎。這是比較容易想到的看法,也的確是古典文獻學與比較文學的事實關係。但這不是全部的事實關係,如果只有一種事實關係,那麼不需要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只要校勘之後研究交流關係,就可以完成比較文學的研究任務。這樣就不需要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只是需要比較文學研究者學習校勘的一般方法。但是古典文獻學與比較文學還存在另一種事實關係:校勘與研究交流關係存在一體關係,校勘就是研究交流關係的一種方式,但其前提是以閱讀書目的用例校勘。古典文獻學的校勘不是必須使用文獻用例,但也可以使用文獻用例。以校勘研究交流關係,必須使用文獻用例,必須使用閱讀書目的用例。如果訛脫衍倒的語詞原本存在交流關係,那麼以閱讀書目的用例校勘,就可以修正訛脫衍倒,同時也可以還原交流關係。交流關係與正確文本是一體關係,語詞訛誤,必然使交流關係脫落,或者產生訛誤的交流關係,但是如果能夠還原正確的交流關係,那麼必然也同時可以還原正確文本。這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原因之一,文學的交流關係可以與版本、小學、語境共同成為校勘依據,甚至可以提供獨立的校勘依據。不過版本、小學、語境存在校勘的有限範圍,比較文學文獻學的校勘方法同樣也存在侷限性,校勘最好是使用綜合校勘的方法。

註釋與校勘不同,沒有修正訛誤的問題,一般需要解釋語詞的意義、來源等等,可以使用文獻用例,也可以不用文獻用例。註釋內容涉及天文、地理、植物、習俗、人名、事件等等,可以說無所不包,也是只能綜合註釋。綜合是相當寬廣的概念,甚至無邊無際,其中自然也可以包括交流關係,語詞、典故的來源實際就是文學關係。如此看來古典文獻學與比較文學文獻學的註釋方法沒有什麼差異,但實際上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其一,註釋在古典文獻學與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地位完全不同。註釋學在古典文獻學中可有可無,但在比較文學文獻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研究交流關係的主要方式。絕大部分的交流關係存在於沒有訛誤的語詞,只有將註釋作為研究交流關係的主要方式,才能完成註釋與研究交流關係的任務。其二,註釋的原則不同。古典文獻學的註釋沒有將交流關係作為出註的原則,但比較文學文獻學是以交流關係作為出註的原則:語詞存在閱讀障礙需要出註,沒有閱讀障礙,只要存在交流關係,仍然需要出註研究交流關係。其三,註釋使用文獻的原則不同。古典文獻學的註釋比較自由,可以使用文獻用例,也可以不用文獻用例,沒有限定使用書目文獻的範圍。但比較文學文獻學的註釋原則是使用閱讀書目的用例,這就意味着原則上應當使用文獻用例,而且應當使用閱讀書目的用例,這樣才有機會研究交流關係。

以校註方式研究文學的交流關係,還會觸及生活世界及其交流關係,即第三關係^⑥。文學的交流關係與第三關係性質不同,但有時存在交叉關係,生活世界及其交流關係也應當是校註的內容。

其一,生活世界是校勘依據。根據不同版本校勘,是因為不同版本出現了異文,語言文字出現了訛誤,也就需要根據不同版本的語言文字校勘訛誤。語言文字總是指稱生活世界的事物,只要語言文字與生活世界事物之間存在指稱與被指稱、記錄與被記錄的關係,生活世界的事物就可以是校勘依據。描述生活世界的語言文字容易出現訛誤,但生活世界本身永遠不會出現訛誤,因而完全有必要以生活世界校勘訛誤。訛誤可以出現在語言層面,也可以出現在語詞與事物的關係,因而需要在語言層面校勘,也需要在事物層面校勘。不過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文本可以有不同的描述,選擇什麼語詞來描述因人而異,這就使語詞與事物之間拉開了一定的距離,距離產生了不確定性,這使生活世界作為校勘、註釋的價值,不如版本那樣可靠,但還是可以提供一定的信息。流動版本的不同異文有所不同,異文並不一定是訛誤,完全可能是情節、細節的變化,也就有必要區別訛誤與變化,否則就容易將變化當成訛誤。

其二,生活世界可以作為校勘依據,那麼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亦可作為校勘依據,交流關係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第三關係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不同國家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一是同一國家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詩人的交遊圈屬於這一部分。這裡重點討論不同國家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這與第三關係完全重合,可以作為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一部分。比較文學文獻學以閱讀書目校註文學層面的交流關係,但第三關係存在於生活世界,超出了閱讀書目的範圍。第三關係不應作為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一部分,但文學層面的交流關係與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存的交叉關係,也就必須有必要引入生活世界及其交流關係,作為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一部分。

梁陶弘景(456~536)的《本草經集注》記載了《人參贊》:“……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桠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椶樹相尋。樹葉似桐甚大,陰廣,則多生陰地,采作甚有法。今近山亦有,但作之不好。”^⑩按照此詩的記載,人參生長在椶樹下。宋代《續博物志》卷八亦載為椶樹,此外其他中韓古代文獻幾乎都是記載為椶樹。段玉裁、王念孫也是如此,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椶:椶木。可作床几。(床錯本作伏,疑誤。釋木曰:櫟椶。《本草》:陶隱居說人參曰: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桠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椶樹相尋。椶樹,葉似桐,甚大,陰廣。《圖經》亦言人參春生苗,多於深山背陰,近椶漆下潤濕處。是則椶為大木,故材可床几。郭云子大如孟者,未知是不也。)從木段聲,讀若賈。(古雅切。五部。)”^⑪王念孫《廣雅疏證》:“參、地精,人參也。(……陶註本草云:上黨人參形長而黃,狀如防風,多潤實而甘。百濟者形細而堅白,高麗者形大而虛,並不及上黨者。人參生一莖直上,四五相對生。花紫色。高麗人作贊曰:‘三桠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椶樹相尋。’)”^⑫段玉裁、王念孫沒有能夠校勘出椶為椶字之誤。

然而並非沒有學者校勘出椶樹的訛誤,戴震在揚雄的《方言疏證》中指出椶樹為訛誤,當為椶樹:“椶: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椶。楫,杙也。江東呼都,音段。(《爾雅》:椶,謂之闌。《曲禮》:大夫、士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闌。鄭註云:闌,門椶。闌,門限。《說文》:槩,弋也。槩,椶同。杙、弋,古通用。……戴震《方言疏證》改作椶,云‘各本椶訛作椶。椶,徒亂反。椶,古雅反。都,椶,一聲之轉。’)”^⑬戴震將椶校勘為椶,指出椶是訛誤。戴震與段玉裁、王念孫都是清代頂尖的小學家,但只有戴震校勘出椶為椶之訛誤。戴震指出椶是“徒亂反”,椶是“古雅反”,讀音不同,故訛誤,椶當校勘為椶。戴震不是根據版本校勘,而是根據小學校勘的。戴震與段玉裁、王念孫都是在小學層面註釋或疏證,那麼段玉裁、王念孫為何沒有校勘出訛誤呢?根據小學校勘是有效的傳統方法,但不是萬能的,常會存在校勘不出的問題。如果小學、版本層面難以校勘,有時生活世界可以提供校勘依據:

其一, 椴樹並不分布於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椴(jiǔ)是柚子一類的樹, 實大如盂, 皮厚可吃。英文 pomelmoose, canque。查《東北木本植物圖志》並無記載此類樹木。椴樹(Tilia)屬椴樹科(Tiliaceae), 落葉喬木或小喬木, 中國有 40 種。《東北木本植物圖志》記載: “本科有 35 屬, 300 餘種, 分布於熱帶、亞熱帶及溫帶區域, 東北有 2 屬 4 種。”^② 北方和東北有紫椴(T. amurensis)、蒙椴(T. mongolica)和糠椴(白椴, T. mandschurica)等。紫椴生於小興安嶺、長白山海拔 500~1600 米處。椴樹稍耐蔭或喜光。適生於深厚、肥沃、濕潤土壤。既然東北沒有椴樹, 《高麗人參贊》的椴樹當是椴樹之誤, 現代植物學著作也是如此^③。

其二, 人參的人工養植技術證明當為椴樹。當代人工種植人參的方法有兩種, 一是在林下種植, 一是在平原種植。林下種植的方法正是模仿了山參生長於椴樹下的特徵: “野山參是緩慢生長的長壽植物, 在林下培育小參, 必須模擬山參的生態環境, 自然生長 15 年以上, 就會培植出與自然生長的野山參相同的山參。一、選地 1. 植被條件選擇椴樹、柞樹、樺樹、榆樹等為主的闊葉天然林, 樹木稀疏高大, 林冠下生有 2 米以上的灌叢, 即二層林, 鬱閉度在 0.5~0.8 之間, 透光率在 15%~25% 之間。”^④ 類似說法也見於其他的農業科技文章^⑤, 這是廣泛運用的方法。

生活世界可以與小學、版本共同提供校勘依據, 也可以獨立為校勘提供依據。調查椴樹、椴樹的分布、人工養植人參的技術是生活世界的問題, 顯然生活世界可以作為校勘依據, 因而應當也可以作為文獻學的一部分。語詞與生活世界的關係是本質關係, 這種關係是否脫落、扭曲, 可以從生活世界的角度調查。椴字誤為椴之後, 椴樹與人參生長的環境失去了關係, 同時也與人參生長特徵失去了關係。語詞與生活世界的關係脫落或割裂, 未必引起閱讀障礙, 但描述的生活世界不再是原本的生活世界。這個問題可以在小學、版本層面解決, 也可以在生活世界層面解決。註釋也存在語詞與生活世界關係的問題, 名實關係就是此類問題。日本五山文學的唐風地名存在名實關係的問題, 唐風地名有兩類: 一是日本地點的常用唐風地名, 例如, 京都稱洛, 二是臨時性唐風地名, 信州是日本地名, 但在詩歌中稱以信陽, 信陽是中國河南的地名。名稱與實際地點並不對應, 這是在註釋解決的問題, 不能將信陽校勘為信州。

根據生活世界的事實校勘似乎與比較文學、交流關係沒有什麼關聯, 不過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是比較文學的第三關係, 因而也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一部分。朴趾源的《熱河日記》記載:

《高麗人參贊》: “三極五葉, 背陽向陰。欲來求我, 椴樹相尋。” 中國文書多載此贊。

椴樹葉似桐而甚大多陰, 故人參生其陰云。椴樹即我國所謂自作木, 以為冊板。我國至賤, 而中原墳墓皆種此樹。^⑥

《熱河日記》的這段文字包含了較多的交流信息: 其一, 文獻的交流關係。中國文獻將椴訛誤為椴, 韓國文獻出現了相同訛誤, 說明中韓文獻之間發生過交流關係。朴趾源記載為椴, 說明《熱河日記》與中國文獻存在過交流關係。椴誤為椴, 椴又誤為椴, 這是因為字形相似。李朝文人李圭景《人蔘詩文辨證說》記載: “二取土: 參性好乾而惡濕, 好陰而惡陽。土性乾燥確礪則不長, 污下卑濕則不長。常陽不長, 常陰不長。土肥而陰, 有陽時照。要之陰陽均而後善長。……椴(椴、椴)盛處宜參。”^⑦ 椴即茶樹^⑧, 是茶樹的別稱。朴趾源以為椴是中原墳墓皆種椴樹, 是因椴樹之誤產生的。椴還是墓樹, 常種植於墓地, 亦用為棺木, 《左傳·哀十一年》: “樹吾墓椴。”^⑨ 兩次訛誤產生了三種樹木, 也就產生了三種文獻的交流關係。朴趾源的記載還有一種訛誤, 中國墓樹有椴, 但還有松、柏、柳等其他樹木。其二, 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也存在於《熱河日記》與《人蔘詩文辨證說》。人參知識、種植技術在中韓生活世界中也有流動, 朴趾源將椴誤為“自作木”, 即白樺樹, 椴樹又誤為

了白樺樹,這樣出現了第四種樹木。椴、櫟與人參無關,生長地域也與椴樹、樺樹不同,只能產生文獻的交流關係,但需要校勘為椴,這種交流關係只存在於文獻層面,不存在於生活世界。但椴樹、樺樹存在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朴趾源將椴樹誤為樺樹,是因為人參也種植於樺樹下,這就與中國人參種植技術的科技論文相同了,表明中韓的人參種植技術產生了交流關係,這就是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椴當校勘為椴,就可以看出椴樹下種植人參的相同技術,“取土”二字表明李圭景記載的是種植人參的技術²⁹,這也是技術交流和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據此亦可校勘。

文學的交流關係與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存在於不同層面,有時文學的交流關係不一定與生活世界的交流關係重疊,不過生活世界及其交流關係是比較文學的第三關係,可以作為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一部分,何況可以提供校勘依據,就更不能捨棄生活世界及其交流關係。生活世界及其交流關係超出了文學層面的交流關係,也超出了閱讀書目的範圍,不能堅持以閱讀書目校註。

四、校註論文化是解決複雜問題的必然選擇

校註可以為研究交流關係構建新的研究平台,如果這一平台只能提供交流關係的排查途徑,不能像論文、專著那樣集中深入地研究,那麼必然是一個難以補救的重大缺陷。校勘、註釋也會遭遇像論文、專著一樣的問題,也就需要像論文、專著那樣集中深入地研究。如果只是承襲校註的一般體例,就無法解決複雜的問題。解決問題的途徑是校註的論文化,一條校勘或註釋同時也可以是一篇學術論文,具有近似於學術論文的特徵。校註與論文結合,可長可短,既能排查,又能深入,這樣可以滿足排查交流關係的需求。

第一,論文化校註的自由空間及其新問題。

論文化校註是以論文方式撰寫校註,這就應當有論文的長度,長度不只是簡單的字數、篇幅,其實也是深度、廣度的問題。只有幾十字、幾百字、千餘字,不可能有深度、廣度,難以成為論文。如果堅守校註的一般體例,必然喪失論文的優勢,也不能解決複雜的交流關係問題。一條校註可以數千字、上萬字,甚至是數萬字,就具備了論文一樣的長度,能夠提供像論文一樣集中深入的研究空間,自然就可以提高校註的準確性,也使校註進一步學術化。如果校註的排查方式是廣度模式,那麼論文化校註是深度模式,可以深入研究語詞、事物與交流關係。論文化校註的目的是解決詩歌文本的語詞、事物中存在的複雜問題,註出各種交流信息,即使沒有能夠完成這一任務,也能為研究者提供更多信息,增加學術含量。

校註論文化是新的校註方式,新的方式存在新的問題:一條校勘、註釋字數太多,篇幅過長,就會給閱讀帶來不便。經學的校註代表了古代校註的最高水平,史籍、別集的校註遠沒有達到經書校註的水平。《十三經注疏》的一些校註也是較長,匯集了不同時代古代學者的解釋。如果讀完這些校註,必然影響十三經文本的閱讀。讀完校註之後,再去讀十三經文本,就會忘記前後文。長註的確給閱讀帶來不便,但這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解決文本中存在的複雜問題,暫時影響閱讀與最終解決問題,孰輕孰重一目了然,這是選擇長註的原因。閱讀不便也有折中的處理方法,閱讀者分為兩類:一是普通閱讀者,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閱讀詩歌文本,不需要校註提供太多的信息與文獻,只需要簡單校註存在閱讀障礙的語詞,就可以完成了任務。二是學者的閱讀需求有所不同,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與文獻,以便給研究提供更多的幫助。校註分為簡註與詳註,論文化校註屬於詳註,但與普通詳註仍然不同。為了便於閱讀別集,也為了便於了解更多信息與文獻。論文化校註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面是簡註,非常簡要地說明語詞、事物的基本內容。後面是詳註部分,也就是論

文化校註的主體部分。這樣閱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各取所需。日本的慣例是將詳註置於書稿的最後,這樣的處理使詩歌文本與詳註脫離,仍然不便。

第二,問題意識是論文化校註的重要特徵。

論文化校註的特徵還在於問題意識,這是與古典文獻學的不同之處。古典文獻學的詳註也有不少長釋,古註有過極長的校註,甚至遠遠超過了今人學術論文的規模。王十朋註《東坡詩集注序》:“昔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丁子襄註《周易》一書,才二三萬言,而君子恨其略。訓註之學,古今所難,自非集眾人之長,殆未易得其全體。”^③秦恭字近君,亦作延君,事夏侯建。漢儒秦延君解釋兩個字用了十餘萬字,遠遠超出了現代論文的規模。僅從註釋的規模來看,漢代已經實現了校註論文化、著作化。但問題不只是在於字數多少,還在於十萬餘字的註釋是否具有論文的問題意識。現在已經無從知曉秦延君註《堯典》二字是如何註釋的,是否具有學術論文的品格。朱彝尊以為:“秦延君說書數文太支蔓,《堯典》僅一篇為言且三萬。”^④如果確如朱彝尊所說,只是過於支蔓,那麼就不是論文。《十三經注疏》的長註也是羅列了很多文獻與古代學者的解釋,長度遠遠不及秦延君的註釋,但性質並無不同。現代學者的校註也有長註,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的樂府篇長註,羅列了很多樂府歌辭,顯然不具備論文的基本特徵。校註的論文化除了字數之外,還必須具備明確的問題。古典文獻學的校註並非沒有問題意識,按斷就是為了解決文本語詞、事物的問題。但按斷一般比較短小,比較簡單的問題可以通過按斷解決,但複雜的問題不是能夠通過數十字、數百字的按斷解決的,即使有了按斷,也未必是事實。從這個角度來說,論文化校註也是一種按斷,只是這種按斷太長,不合慣例,不宜名為按斷。

第三,論文化校註與校證、箋證、疏證等古代文獻學用語的差異。

論文化校註與校證、箋證、疏證等古代文獻學用語的異同也是一個問題,古典文獻學有富於考釋的研究性校註,多名為校證、箋證、疏證等等,其中也有明確問題的校註,可視為長短不齊的大小論文。如此看來論文化校註應當名為校證、箋證、義證、發微等,^⑤但比較文學文獻學的論文化校註除了論文品格之外,還包含了特定的任務與方法:校註作為交流關係的研究方式,應當引入閱讀書目、潛在書目(交遊圈)、替代書目、生活世界等因素,這樣與校證、箋證、義證等大不相同。如果冠以箋證之類名稱,必然引起誤解,產生困惑,還會破壞古典文獻學的成熟概念。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不是為了破壞古典文獻學成熟的概念與規範,而是嘗試其他的方法與問題。比較文學文獻學論文化校註的性質不同於箋證、義證等,因而不能從校證、箋證、義證中自然長出。如果能夠在古典文獻學的基礎上自然長出,就不會等到今天仍然沒有出現比較文學文獻學。

從校註到論文並不遙遠,重要的是明確校註論文化的原因,否則即使近在咫尺,未必能夠跨出最後一步:

其一,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的分離無益於研究交流關係。學術界不大提及論文化校註的問題,有的學者以為論文化校註可有可無,並不重要。古典文獻學並不要求校註的論文化,校註屬於古籍整理,研究交流關係屬於學術研究,各有各的任務,兩個平台分離並存^⑥,沒有必要提出校註的論文化。然而為了推進交流關係的研究,比較文學必須在文獻學層面上研究交流關係,這樣需要整合比較文學與古典文獻學,比較文學文獻學也就具有了雙重任務。既要整理古籍,也要研究交流關係,其實也是整合了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打破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的分離現象,可以雙向推進與彼此助益,可以提高學術研究與古籍整理的價值與準確性。

其二,排查交流關係是校註論文化的原因。排查交流關係必然遭遇各種問題,其中有簡單的問題

題,也有複雜的問題。簡單的問題可以採用傳統的校註方法,但複雜的問題未必能夠傳統的校註方法解決。不了解語詞、事物的相關信息,無法註釋,只好標記為不詳、不明,這是校註的特權,也是常規動作。但排查交流關係,就不能出現太多的不詳、不明,因此只好校註論文化,其目的是解決不詳、不明的問題,最終確定有無交流關係,從而完成排查交流關係的任務。這裡似乎存在另外一種選擇的可能性,只註研究的結果,並不提供研究過程與文獻用例,這樣就可以大大縮減字數,保持古典文獻學傳統的校註慣例。不過只註結果,恐怕無法相信,達不到校註的目的。瀟湘八景的地點是學術界一直沒有能夠解決的問題,如果直接註明瀟湘八景各在何處,顯然無法接受。校註者也可以選擇一種看法註釋,或者註出主要的幾種看法,但這樣終究沒有解決問題,沒有完成註釋的任務。不僅要註出結果,也要註出研究過程與文獻用例,校註必然會論文化,必然打破校註與論文的界線,打破學術研究與古籍整理的界線。

其三,解釋語詞意義與研究交流關係的差異是校註論文化的原因。古籍整理的校註任務主要是解決語詞意義的問題,比較文學文獻學增加了還原交流關係的任務。一般來說交流關係更為複雜多變,難免需要更多的文字;語詞意義也會有變化,但相對比較穩定。交流關係變動不居,複雜問題更多,也就大大增加了校註論文化的需求。交流關係涉及的因素、內容也遠遠多於語詞意義,交流關係包括了語詞意義與交流時間、範圍、用例以及書目、篇目等等,語詞、事物從一個國家傳入到另一國家,基本意義也會隨之一起傳入,可以保持不變,但也可以變化,研究基本意義也是研究交流關係的一部分。但是基本意義與交流關係是兩個領域,解決了基本意義的不明、不詳,不等於解決了交流關係的不明、不詳。古典文獻學校註的主要任務是還原正確文本、解明語詞與事物的基本意義,通過校註疏通語詞、事物的內容,消除閱讀障礙,也就完成了校註的任務。但比較文學文獻學在校註基本意義之後,還需要繼續調查交流信息,從而註出交流關係。校註基本意義與交流關係可以合而為一,但不能因此混為一談,畢竟這是不同的兩個領域。雙重任務也可分離,如果語詞的基本意義簡單明瞭,不需出註,那麼可以只研究交流關係。或者只需解明基本意義,不需要研究交流關係,因為不存在交流關係。

其四,比較文學與古典文獻學的矛盾與糾纏是校註論文化的原因。比較文學文獻學以校註方式研究交流關係,同古典文獻學既可重合,也有衝突,全部移用古典文獻學的方法,就無法研究交流關係。從古典文獻學角度來看需要校勘的語詞,對於比較文學文獻學來說未必需要校勘,只需要註釋,因為古典文獻學與比較文學文獻學的性質不盡相同。校勘與註釋的糾纏是必然遭遇的問題,五山詩人瑞溪周鳳《壽星像》的“元祐年間謁內廷”^④,寫的是壽星在宋代元祐年間降臨了宋朝都城皇宮。但中國文獻並無元祐的記載,都是記載為嘉祐。如果據中國文獻來看,元祐是訛誤,應當校勘。但如果深入調查,就會發現這不是訛誤,而是變異,所有五山詩人寫的都是元祐年間,並在元祐年間基礎上又出現了蘇軾、司馬光等人的想象。如果將元祐校勘為嘉祐,必然會得到錯誤的結果。如果以註釋來研究,就會出現另一種交流關係。以校註方式解決此類問題,必然使校註論文化。東亞古籍的校註含有交流信息,已經進入到了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領域。但此類著作基本是古典文獻學的延伸,不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校註。交流關係與校勘、註釋的糾纏沒有成為此類著作的問題,其原因是按照常規方法校註,難以遭遇校勘、註釋與交流關係糾纏的問題,也難以發現註釋的交流信息並不正確,有時錯誤太多,未必是校註者的問題,而是校註方法的問題,這正是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原因之一。

校註的論文化不可避免,但不會替代學術論文,二者還是有一定的差異:其一,校註是圍繞着文

本的語詞展開,要解答語詞、事物的基本問題。學術論文也可以圍繞文本的語詞、事物展開,但並不限於此類問題。校註與論文存在重合的方面,也存在不重合的方面。其二,校註的論文化可以提供論文研究的問題,但重點是提供相關文獻,引文較多,沒有太多的解釋與分析。論文也會提供相關文獻,但解釋與分析是主要的方式。校註的論文化與論文存在差異,不能直呼為論文。校註的論文化沒有程度的要求,論文化程度有高有低,論文化的用語體現論文化的實際狀態,這也是與學術論文不同之處。校註與論文的結合,可以打造研究交流關係的新平台、新方式,可以兼收校註與論文的優點,全面排查與集中深入結合,這是最為明顯的優勢。

①2010年筆者第一次提出了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想法:“比較文學研究多重視理論化的研究,較為缺少文獻學的基礎,也沒有相對完整地建立過比較文學自己的文獻學。中國的比較文學總是離不開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較為密切的是東亞文學。東亞比較文學應當率先建立比較文學文獻學,沒有文獻學基礎的比較文學總是沒有根基的學科,這是比較文學走向更為成熟的必要條件。”(張哲俊:《序言:輝煌學術的發生與發展》,見《嚴紹璽學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7頁)此文還簡單指出了比較文學的教材問題:“縱觀現在出版的各類比較文學教材,數量可謂壯觀,但是遺憾的是都沒有講述比較文學文獻學。比較文學是一門相當獨特的研究領域,應當建立自己的文獻學。然而這也不是中國國內學術的問題,似乎國際比較文學研究中也相當缺少文獻學,多是在追逐着各種眼花繚亂的主義。建立自己的目錄學和文獻學,這是中國比較文學走向更為成熟的必由之路。”(《嚴紹璽學術研究》,第7~8頁)這裡將目錄學與文獻學並列起來,並不是指目錄學與文獻學是並列的兩個領域,而是可以先嘗試着建立比較文學的目錄學,然後再着手建立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其他部分。比較文學文獻學也只能是從限定在一定範圍內嘗試,這不只是限定在兩、三個國家的文學,甚至有必要限定在一定時間範圍內的文學來研究。因為比較文學文獻學也和文獻學一樣,應當是實踐性的學科,沒有文獻研究的研究實踐,就無法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僅從這篇文章來看,建構比較文學文獻學像是在喊口號,但筆者從2005年一直到今天,從來沒有放棄這一理想。2005年開始嘗試以註釋的方式寫《楊柳的形象:物質的交流與中日古代文學》,《韓國壇君神話研究》與《韓國

上古詩歌研究》加入了校勘的問題。《第三種比較文學的觀念——文學考古學的可能性》主要研究了生活世界的交流與比較文學的關係,生活世界也是比較文學文獻學的重要因素,提供了校勘、註釋的依據。比較文獻學與比較文學文獻學是最近的領域,但實際是兩種不同的文獻學,比較文獻學是在古典文獻學的層面上研究,比較文學文獻學則與古典文獻學存在較大的距離。西方的比較文獻學或比較語文學歷史悠久,近年國內也出現了比較文獻學成果,其中有一部分使用了比較文獻學的概念。

②比較文學的法國學派向以實證研究著稱,存在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可能性最大,但法國學界似無以閱讀書目校註的成果。法國阿爾多瓦大學東方學系主任、文本與文化中心主任金絲燕先生以為:“法國不做這樣的研究,因此沒有。”(微信回覆:2022年7月29日23時2分59秒)。沈衛榮近年介紹了西方語文學的成就,《回歸語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與《何謂語文學: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和實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是翻譯與評介了20世紀西方語文學的成就,其中並無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信息。保羅·德·曼與賽義德是20世紀呼籲回歸語文學的旗幟性人物,但他們在語文學上有多少新的建樹是值得懷疑的:“Paul de man與said都是傑出的文學理論家,他們雖然都呼籲‘回歸語文學’,甚至也都自我標榜為語文學家,但與他們在文學理論上的創新和造詣比較起來,他們對語文學的理解和詮釋實在相形見绌,乏善可陳。嚴格說來,他們都沒有對語文學本身提出任何有啟發意義的新見解。……更談不上是一種學術創新。”(沈衛榮:《回歸語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97頁。)

- ③章學誠撰,葉瑛校註,靳斯點校:《校讎通義·校讎條理第七》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84頁。
- ④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Early Years. An Anthology of Essays, ed., by Hans-Joachim Schulz, Phillip H. Rhein, New York: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3, pp. 223.
- ⑤⑥千永昌等編譯:《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157頁;第125頁。
- ⑦③④瑞溪周鳳:《臥雲藁》,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卷五,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第579頁;第575頁。
- ⑧橫川景三:《蘆菴集》,《五山文學新集》卷一,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第853頁。
- ⑨王十朋:《東坡詩集注·和陶九日閒居》卷三一。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四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260頁。
- ⑩天隱龍澤:《默雲藁》,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卷五,第1197~1198頁。
- ⑪蘭坡景莖:《雪樵獨唱集》五、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卷五,第302頁。
- ⑫邵庵全雍:《建長寺龍源庵所藏詩集·邵庵老人詩·扇面山水》二,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卷三,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第583頁。
- ⑬司馬遷撰,張守節正義:《史記》卷一百二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272頁。
- ⑭論著也可以逐一研究每一字詞,拙著《韓國壇君神話研究》、《韓國上古詩歌研究》就是採用了這種方式。但這不是普遍方式,只限於字數不多的文本,如果字數較多,就只能採用校註方式。
- ⑮法國學者梵·第根以為:“地道的比較文學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在兩個因子之間的‘二元的’關係”,是“對一個放送者和一個接受者之間的二元關係之證實;這些因子或者是作品,或者是作家,或者是作品或人的集團:這些關係則是關於藝術作品的實質和內容的。”(梵·第根:《比較文學論》,戴望舒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9年,第138頁。)
- ⑯參見張哲俊:《第三種比較文學的觀念——文學考古學的可能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 ⑰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草木上品·人參》,上海:群聯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
- ⑱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木部》第六篇,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4頁。
- ⑲王念孫撰、鍾宇迅點校:《廣雅疏證·引之述·釋草》卷第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21頁。
- ⑳章學誠:《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卷五,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389頁。
- ㉑劉慎諤等:《東北木本植物圖志》,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416頁。
- ㉒日本學者上原敬二是植物學學者,他所撰寫的《樹木大圖說》是常用的工具書,但也是將椴樹誤為椴樹,幸好他註明了椴樹的西文學名:“紫椴: *Tilia amurensis* Rupr, 落葉喬木,高20米,直徑0.7米,樹皮灰色,幼枝無毛或微毛。葉互生,長柄,不等邊心形,尾狀銳尖,銳鋸齒,上面無毛,下面脈沿密毛。六月開花。果實球形,倒卵形,生白色或褐色毛。朝鮮(北部)、滿洲、東西伯利亞產,用於路樹。”上原敬二:《樹木大圖說》第二冊,東京:有明書房,昭和三十四年,第1128頁。
- ㉓杜韌強、康爾豔、宋連彬:《林下種植野山參技術》,呼和浩特:《現代農業》,2001年第4期。
- ㉔“1,林地選擇 野生人參,一般生長在以紅松為主的針闊葉混交林中。對環境條件要求比較嚴格,多生長在腐殖質深厚的陰坡密林中,陽坡只見於隱蔽的石應子及林木遮蔭良好的地方,有時亦見於松柞林內較濕潤的地方。仿照野生人參的生長環境,選擇排水良好,有15cm左右厚的腐殖質土層,鬱閉度0.7~0.8,半陰半陽坡,坡度15°~30°,主林層以柞、椴、樺、色等樹種組成的雜木林或紅松人工林為宜。”(佟立君、李春偉等:《人參林下栽培技術》,黑龍江牡丹江市:《中國林副特產》,1999年第1期。)
- ㉕朴趾源:《燕岩集·熱河日記·銅蘭涉筆》卷之十五,《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52冊,第322頁。
- ㉖成海應:《研經齋全集外集·草木類·續種參譜》卷五十四,《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77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年,第481頁。
- ㉗李時珍:“音舛,頌曰:郭璞云:早採為茶,晚採為茗。一名薺,蜀人謂之苦茶。陸羽云其名有五,一茶,二檟,三藪,四茗,五薺。”“集解:《神農食經》云:茶茗生益州及山陵道旁。……頌曰:今閩、浙、蜀、江湖、淮南山中皆有之,通謂之茶。”(《本草綱目》卷三)

十二(中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年,第1535~1536頁。

⑳《春秋左傳正義·十有一年》卷第五十八(下冊),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660頁。

㉑李圭景(1788~1856)記載:“我東家參創自正廟初年,至純廟中葉始盛,遍於一域,今則其賤如桔梗矣。山參亦無處不產,而關西之江界府廢四郡為天下第一。”(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人事篇·技藝類·醫藥》,抄寫本),正廟即正祖(1752~1800,在位1776~1800),家參就是人工種植的人參,這說明最遲18世紀朝鮮已經出現了人參種植技術,這種技術與中國大體相似,說明產生過技術交流。

㉒王十朋註:《東坡詩集注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9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頁。

㉓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二十一,《四庫全書》,第1317冊,第630頁。

㉔關於校、注、箋、疏、證、集、釋以及義證、發微等等,文獻學教材已有不少的記述,這裡沒有必要重複。不過為了便於正確理解論文化校註,有必要簡要記述幾個主要概念。一般而言第一層註釋是註,第二層註釋是箋(補充註釋),第三層註釋是疏(綜合註解),第四層註釋是證(如義證、疏證等,有時考釋書的局部)。有一部分意義已經轉化,校證、箋證等用語的證未必是指第四層的註釋,而是多指包含更多考釋內容的註釋。此類意義近於論文化校註,但都沒有引入比較文學文獻學的主要因素,因而仍然是完全不同的校註。

㉕參見張哲俊:《五山文學的研究與別集的校註》,北京:《日語學習與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簡介:張哲俊,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任教於文學與新聞學院,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從事東亞古典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東方學術》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會審專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華外譯項目評審專家,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兼職教授。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兼職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研究所研究員,早稻田大學高等研究所研究員,日本文部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國人研究員,韓國國立麗水大學校客座教授等。著有《楊柳的形象:物質的交流與中日古代文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韓國壇君神話研究》、《韓國上古詩歌研究》、《第三種比較文學的觀念——文學考古學的可能性》、《東亞比較文學導論》、《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等十餘部著作,發表中外文論文100餘篇,曾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北京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

[責任編輯 劉澤生]